

王涣之：历经坎坷仍从容的北宋榜眼

特约撰稿人 毕建国

王涣之(1060-1124)，字彦舟，常山芙蓉章舍(今属常山县芳村镇)人，北宋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甲科榜眼。曾任杭州教授、颍上知县，升给事中、吏部侍郎，授宝文阁直学士，后因病调安徽亳州任明道宫提举。卒后，诏赠正议大夫。

王涣之与北宋书法家米芾情同手足的故事，知晓的人可能比较多。但他榜眼受挫，以及历经坎坷仍从容的故事，知晓的人可能少之又少。

历经坎坷志更坚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王涣之一举登进士甲科榜眼，“有司疑年未及铨格”，王涣之无从争辩而悄然无声地离开了京都。后朝廷查实其当年为19周岁，因而下旨特除武胜军节度推官。这一“怀疑”，对王涣之最初任职影响很大，甚至让后人忘记了他的榜眼身份。比如，宋布衣彭百川所撰《太平治迹统类》卷27就说：“元丰二年三月庚辰，御集英殿策试，遂赐时彦、陈灌(当为灌)、朱浚明、晁补之、家彬、张康国等三百四十八人及第、出身。”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2009年主编出版的《宋登科记考》载：陈莹中(名陈灌)，福州罗源县人，元丰二年中进士第二。幸好，宋代著名历史学家李焘(1115-1184)所编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有记：元丰二年八月，“诏新赐进士第二人王涣之特注官。涣之年十九，碍铨格故也。”

因为起跑线上受挫，王涣之从政的起始进度受到影响，只有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在他任武胜军节度推官期间，太学实施新法度，皇上首除敦厚通经术者数人充内外学官，王涣之因此被选为杭州州学教授；直至元丰八年(1085)，迁宣义郎，知颍州颍上县事，改越州教授，再移杭州教授；元祐三年(1088)召以太学博士，迁宣德郎；元祐七年(1092)，校对黄本秘书，迁奉议郎、武骑尉；元祐九年(1094)，丁母亲忧，服除，通判卫州；绍圣五年(1098)，调枢密院修书局，参与续编《两朝鲁卫信录》；元符三年(1100)，迁承议郎、云骑尉，后除尚书吏部员外郎，充国史院编修官，再迁朝奉郎、赐五品服，寻兼《哲宗实录》检讨官、修《元符敕令》参详官，迁尚书左司员外郎。从政最初的二十年，就这么艰难、缓慢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

不惑之年，本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可王涣之的职业生涯却进入了一个长期被折腾、甚至被压制的怪圈。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迁起居舍人，除中书舍人，充实录修撰，赐三品服；崇宁元年(1102)，迁给事中，寻迁尚书吏部侍郎；崇宁二年(1103)，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因党争在赴任道上即被削职，改知舒州；崇宁三年(1104)初，因被蔡京列入“元祐党籍”，而被罢官，是年秋知福州，道移广州，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大观元年(1107)，回到吏部侍郎，当年又因党争黜知洪州，移知滁州、起知潭州；大观二年(1108)，移知杭州，兼两浙西路马步军总管；大观三年(1109)，差提举洞霄宫，久之，起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道移扬州，充淮南东路马步军总管。大观四年(1110)，复任给事中，迁吏部侍郎；政和元年(1111)，以显谟阁待制出知寿州，又因党争到任不久即被削职，改提举舒州万寿宫；政和五年(1115)，复宝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政和六年(1116)，起知滁州，次年，迁朝议大夫，进封太原郡开国侯；重和元年(1118)，移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居数月，移中山府路安抚使兼知武定军，年末加宝文阁直学士；重和二年(1119)，因病差提举亳州明道宫；宣和二年(1120)迁中

奉大夫，食邑增至一千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人生关键的二十年，就这么艰难、曲折地左右徘徊着，历经坎坷却走不出循环往复的怪圈。

但是，王涣之凭着一种“越战越挫，越挫越勇”的精神状态，终于平稳而从容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宣和六年(1124)夏，宝文阁直学士、中奉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太原侯王涣之，以病告老，诏迁中大夫，以旧职致仕。是年七月四日，王涣之病故，享年六十有五，镇江府以闻，诏赠正议大夫。

淡泊从容建功业

王涣之天性端厚、淡泊从容。“自为儿时，不妄戏笑，见者不敢慢，期以远器。”“未冠，一旦以诸生奉大对，褒然文采动一时，多士无出其右者。然公方淡然，无仕进意。”

王涣之的一生，尽管从政生涯奔波不定、历经坎坷，但他始终秉持淡泊从容之本性，一有时机就运用他的聪明才智，为国为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创下了平凡而留芳的功业(以下数列三、四)。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徽宗赵佶被立为帝。是年日食正阳之月(即四月)，宋徽宗下诏求直言。王涣之因大臣交荐应对曰：“求言非难，听之难；听言非难，察而用之难。今国家每下直言之诏，而下之报上，乃或以指陈缺失为讪上，以阿谀佞谄为尊君，以议论趋时为国是，以可否相济为邪说。志士仁人知言之无益也，不复有言。而小人肆为诡譎可骇之论，苟容偷合。此尤不可不察也。愿陛下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今昔，唯当为贵；人无同异，唯正是用。则人心悦，治道成，天意得矣。”帝嘉纳之，并因此命以谏官、御史。可他却坚定地推辞说：“臣以大臣荐，不可居是官。”(见《宋史》卷三百四十七之《列传第一百六》)

崇宁二年(1103)，王涣之以宝文阁待制知安徽舒州。时淮右即淮南西路(今安徽中部、湖北黄冈、河南潢川一带)百姓因灾受饥饿，到处流动转移的灾民纷纷来到舒州。王涣之组织作出妥善安顿，命流入灾民依附城市野地宿息，然后有次序地开仓放粮予以救济，因此救活百姓几万人。

崇宁三年(1104)秋至五年(1106)，王涣之在广州任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广州为岭南都会，番夷杂处，吏事繁猥。公政理详明，恬若无事。有番豪杀其奴，舶司援旧例，送番长杖笞(杖打)。在政三年，一路之广，周环万里，岁丰人和，盗贼衰熄。”

大观元年(1107)，王涣之知潭州(今属河南省)，充荆湖南路安抚使。此前，傜贼经常出入潭州，祸害当地居民。王涣之部署采取了多项有效措施，包括严明规章制度和纪律，安排侦查士兵进行全天候谨慎的侦察、候望，软硬兼施、谕以利害等等，终使傜贼不敢侵扰，潭州边境得以安宁。

王涣之先后参与完成了《两朝鲁卫信录》《哲宗实录》《元符敕令》和《神宗实训》等史书的编修工作。他最初入职时，在州学教授六年，书成《博士考》五卷，当时的同行也感到深不可测。他还自编文集三十卷，可惜均已散失。

北宋官员、诗人，也即王涣之表侄儿程俱(1078-1144)在《宝文阁直学士中大夫致仕太原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四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正议大夫王公墓志铭》中，评价王涣之曰：“惟公简而和，静而敏，端亮而有容，观其雍容醞藉，进趋语默，知其为德人也。平居寡言，出言成文，必诣理而中会。及论古今治道，亶亶而不烦。见公者势利俚俗之言不能出口。俱常以谓公有叔度之宏雅，而无东汉之沾激；有献之之风流，而无晋人之狂放。”



▲ 王涣之像 来源于网络

真诚平和挚友多

王涣之一生最要好的朋友应该是北宋书法家、画家、奇石鉴赏家米芾(1051-1107)。他们自寻晋帖奇石开始，渐成至交。米芾于元祐元年(1086)八月撰成的《宝章待访录》之《王右军书家谱》云：“右在山阴县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涣之以书抵某，具言有此书。”可见，在此之前王涣之同米芾已经结识，并为米芾寻找王羲之书帖等珍品提供过信息。民间有传言，说常山“巧石”在北宋时名扬天下，与米芾通过王涣之收集常山奇石很有关系。之后，米芾作有《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送王涣之彦舟》等诗帖，把自己的出身年月、家庭背景和交友情况等和盘告诉王涣之，表明到此时两人关系已经相当密切。元祐三年(1088)九月二十三日，米芾所作且被后人誉为中华第一美帖的《蜀素帖》，即以《送王涣之彦舟》作为压轴诗。在后来的持续交游和诗书往来中，他们的情谊渐趋醇厚。据不完全统计，米芾写给王涣之的诗帖以及涉及王涣之的书帖多达几十封。大观元年(1107)，王涣之摘蒋蕤之奇(颖叔)刻在岭峤的诗文寄给米芾，米芾于是年六月回致王涣之书札《经略帖》，依旧牵挂着王涣之的命运走向。可见，在米芾临终前，他俩依然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信息交流，足见他俩关系之密切。(详见本人《王涣之与米芾：诗书文人的君子之交》)

米芾是王涣之诸多挚友至交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王涣之一生有文字记载的挚友还有不少。

官至右丞相的曾布曾是王涣之的挚友。如前所述，绍圣五年(1098)，王涣之被知枢密院事的曾布选进修书局参与续编《两朝鲁卫信录》，受到曾布的高度器重。随着《信录》续编工作的快速、保质推进，他们的关系也渐趋密切。王涣之的从政生涯也在完成续编之后进入一个快速上升期。据民间传说，曾布曾抽出时间到常山菱湖看望其女婿的父母，王涣之也陪同一起前往(目前未见文字记载，留待考证)。

同年进士、官至左司谏的陈瓘与王涣之的关系也非同一般。陈瓘(1057-1124)，字堂中，号了斋，登元祐二年(1079)进士甲科探花。王涣之同陈瓘成为同年进士后就非常投缘，他们因有共同志趣，一段时间常在一起论道。在程俱为

王涣之所作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大观元年(1107)，召赴阙，且以为吏部侍郎。”

北宋官员、诗人程俱晚辈也是王涣之的忘年至交。政和元年(1111)，程俱曾为王涣之作《客舍写怀呈王八丈侍郎(王涣之外号)五首》，其一曰：“君门如云汉，可望不可攀。地上挟冰子，肉身无羽翰。岂无国士知，势有不得言。空怀激扬意，归坐自长叹。此意重千金，宁论官九迁。所愧误赏音，赏音从古难。”程俱还为王涣之作《王八侍郎祭文》和《墓志铭》，其《墓志铭》一开头即曰：“明年(1125)，其孤樅以状请铭于俱，俱以公名德之重、侍从之老，当得道艺、爵齿相先后者铭，辞不称。樅泣且言‘惟公先公所器重，知先公之志业又详，否则无以慰九原。’俱于是不敢辞。”由此可见，王涣之生前与程俱过从甚密，程俱对王涣之既非常了解也十分敬重。

留下文言二三篇

《宋史》记载王涣之有云：“趋省之日，词头三十三，下笔即就。”如此才华，照常理王涣之应留下许多诗词文章。史料又说王涣之曾作有《博士考》五卷、文集三十卷，可目前均无从查找。最近，经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只找到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衢州溪桥记》，落款为“(大观)二年(1088)夏四月辛巳，显谟阁待制、荆湖南路安抚使王涣之记”；另一篇是《南壁徐襄愍公(幸隆)墓记》或称《宋节度使襄愍公墓碑文》，可史载王涣之去世于宣和六年(1124)，徐幸隆战死于靖康二年(1127)，因而此《墓记》究竟是否王涣之所作可谓一个谜。当然《墓记》讲明是按照侍讲龚原所作行状表达世系，龚原(约1043-1110)，浙江遂昌人，于元祐元年(1098)权工部侍郎兼侍讲，累官至兵部侍郎、宝文阁待制，其去世时间也早于徐幸隆。因此是否有可能徐幸隆提前请王涣之为作《墓记》初稿，实在不得而知。

目前，经由史料真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王涣之文言只见前面提及的两则，其一 是他的应诏名言：“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今昔，唯当为贵；人无异同，唯正是用”等语；其二是他的“醒世恒言”：“……仕官常以不遇处之，则无事矣。”这既是他的一种醒悟，更是他直面困难、淡泊从容的一种自觉。